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

深化改革 三方面破除制约消费障碍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可以从继续推动城镇化，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意愿；坚持“房住不炒”，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完善商品和服务的质检和消费者保护体系三方面着手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消费的障碍。从整体上看，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对供需两侧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消费的反弹仍需时日。

他认为，针对消费升级，未来将从传统的“生存型消费”升级为“发展型消费”；从“城、乡分隔消费”升级为“城乡一体化消费”；从“线下消费”升级为“线上消费”；从“物质富”升级到“文化富”“精神富”。

● 本报记者 焦源源

继续推动城镇化

中国证券报：我国居民消费总体相对偏低，在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消费的障碍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何海峰：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消费的障碍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继续推动城镇化，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意愿。研究表明，提高人口城镇化率对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升消费意愿有重要作用。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对城乡人口流动有积极意义。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不仅可以提升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还有利于推动人口向城镇集聚。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下，没有户籍就不能享受当地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源。因此，除提高人口城镇化率外，还应当关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但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5.4%，提升空间较大。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增加居民保障、提升消费意愿的可行举措，地方政府应当实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互联互通，以保障流动人口的福利。

其次，坚持“房住不炒”，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2021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为62.2%，快速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居民杠杆率的变动与房地产市场走势相关性较高。若房价快速上涨，将进一步加重购房负担，降低消费意愿。因此，稳房价、增加保障性住房可以作为促消费的一种间接方式。

再次，完善商品和服务的质检和消费者保护体系。《意见》提出，要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一方面，统一的质量体系可以提升消费者对于“国货”的认可度，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另一方面，完善消费者保护体系可以有效解决消费者投诉和纠纷，提升消费者体验，也对消费意愿提高有推动作用。

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大宗消费能力

中国证券报：引导金融机构丰富大宗消费金融产品，有哪些着力点？

何海峰：在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下，除加大投资力度，扩大消费亦是拉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所在。引导金融机构丰富大宗消费金融产品，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提供不同期限、不同担保质押要求的大宗消费信贷产品，丰富相关金融产品序列，以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需求。创设普惠消费信贷，将普惠型贷款适当向消费群体大宗消费中“急难愁盼”领域倾斜，主动跟进并有效满足其大宗消费信贷需求。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消费群体，做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相关贷款的接续转换。与此同时，发挥动态消费信用监控数据和个人征信数据作用，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符合大宗消费特点的相关质押类贷款产品。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机构消费者提供贷款增信支持，依法依规及时履行代偿责任。

二是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售后服务。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按市场化原则优化审批流程，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消费群体开辟绿色通道，提供灵活便捷服务。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综合考虑自身经营状况和客户还款能力基础上，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必要时适当减少收费。

三是帮扶重点群体。对于货车司机、货运物流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因疫情影响偿还汽车贷款暂时有难处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视情合理给予展期或续贷安排，帮助该类企业和个人渡过难关。

四是确保资金安全。银行等金融机构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并重的思想理念，及时有效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防止相关资金被挪用、转借或者用于其他用途。

以上举措着眼于打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将有效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大宗消费的能力和效率，帮助个人和机构消费者纾困解难，实现整个社会消费层面的快速恢复和有力增长。

消费反弹仍需时日

中国证券报：疫情影响下，如何进一步做好特困行业纾困，更好促进消费恢复发展？

何海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餐饮、零售、旅游等消费行业受到影响较大。做好企业纾困，做到稳市场主体、稳就业，是促进消费恢复的根本所在。

从行业类别来看，餐饮、零售、旅游、交通客运等服务业属于接触性聚集性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以航空运输业为例，近日国内三大航空公司相继披露年报，2021年国航、东航、南航亏损均超百亿元。从企业规模来看，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些企业抗风险能力偏弱，加之疫情影响下供应链和物流受阻、上游涨价、下游账款拖欠等，面临较大经营压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减负纾困等政策。餐饮、住宿、零售、文化、旅游、客运等行业就业容量大、受疫情影响重，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以倾斜。财税方面，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并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今年对留抵税额提前实行大规模退税。延续执行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等阶段性稳就业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明显提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金融方面，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优化监管考核，推动普惠小微贷款明显增长、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持续提升。推进涉企信用信息整合共享，加快税务、海关、电力等单位与金融机构信息联通，扩大政府性融资担保对中小微企业的覆盖面。加大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力度等。

从全国来看，各地已结合实际，纷纷出台了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的地方性措施。如，江苏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暂免增值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广东推动应收账款融资；浙江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服务业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支持；江西省高院针对涉及承担疫情防控任务的相关企业审慎采取强制措施，使用信用修复激励机制。在央地政策的联动配合下，相关措施将切实有效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迎来更好发展。

中国证券报：你认为，消费增速何时能够触底反弹？

何海峰：疫情对消费造成较大冲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20年和2021年的平均增速为4%，仅为疫情暴发前的一半。

导致消费增长低迷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从供给侧看，相关防疫措施对聚集性接触性消费的制约使餐饮、旅游、文娱等行业生产经营受限。例如，相关数据显示，受3月疫情散发影响，全国电影总票房收入为9.12亿元，同比下跌63.6%。从需求侧看，一方面，疫情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拖累了消费复苏。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上升导致消费意愿下降，人们预防性储蓄增加。根据人民银行城镇储户调查问卷，2020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受访者占比较前值下降6个百分点到了22%，相应地，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受访者占比较前值增加7.3个百分点至53%，截至去年四季度这两类受访者占比仍分别为23.7%和54.7%，说明疫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改变了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从整体上看，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对供需两侧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消费的反弹仍需时日。一是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传染性上升，加剧了国内疫情扩散风险。建议未来进一步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优化疫情防控举措，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此，我们要有耐心和信心。二是当前国内外环境出现了一些超预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居民收入增长承压，预期转弱，因此消费在短时期内难以快速反弹，对此，也要有耐心。



四方面进行消费升级

中国证券报：你认为，未来消费升级的方向有哪些？

何海峰：进入“十四五”时期、新发展阶段，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稳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未来消费升级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从领域上看，从传统的“生存型消费”升级为“发展型消费”。就“衣食住行”“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等基本生活保障项目而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的消费阈值会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会发生显著变化。在日常的吃穿用得到满足后，消费重心将逐渐向住房改善、知识学习、出行便利、医疗保障等领域倾斜，以满足舒适、便捷、健康等高层次需求。同时，传统消费领域也将面临深刻变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商品和服务的模式、品牌、品质都将得到极大丰富和提升。

从区域上看，从“城、乡分隔消费”升级为“城乡一体化消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区域联通、安全高效的电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网络”，并“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未来商品、资金、劳动力、土地等在城乡市场间的流动将更加顺畅，前期我国城、乡市场的分隔状态将向城乡一体化转型。商贸流通企业、电商平台将向农村延伸，乡村消费潜力将得到充分挖掘，家电、汽车等改善性消费也会增加。

从模式上看，从“线下消费”升级为“线上消费”。经历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两次技术革新后，居民的消费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线上消费快速增长，占比显著增加。今年1-2月全国网上零售额总计19558亿元，同比增长10.2%，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高出3.5个百分点。未来5G、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颠覆传统消费场景，加速商品和部分服务消费的线上化、平台化进程。

从境界上看，从“物质富”升级到“文化富”“精神富”。伴随着消费的线上化、网络化、文化消费、内容消费将成为新的增长点。疫情暴发后，网络文化消费异军突起，数字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和传统文化产业的融合也在加速，一些演出或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拥抱大众，让用户有了多元化的体验渠道。

战略储备释放 对全球石油市场影响有限

●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

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从5月起每天从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100万桶石油，持续时间为6个月，以此抑制和稳定大幅上涨的全球石油价格。这是拜登政府半年内第三次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然而，此举是否真正稳定目前全球油价的大幅度波动？

缓解短期市场担忧

短期来看，此次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提振了市场信心，市场对于石油供给的担忧有所缓解，并逐步反映到价格侧。自美国释放石油储备后，国际油价回调趋势明显。4月7日，国际能源署（IEA）也积极跟随美国的脚步，宣布计划释放1.2亿桶石油储备，其中6000万桶石油储备由除美国外的其他成员国负担。然而，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不是为了解决供需问题，而是救急，因此释放只有短期价格作用。只要国际局势不稳定因素存在，当前的石油储备释放并不足以大幅度降低油价。如果相关局势恶化，目前释放的石油储备数量并不够，油价还是会继续上涨。

中期看，全球石油价格能否稳定，主要取决于石油供给侧产能是否可以快速提升和有效替代俄罗斯石油出口。根据美国能源署报告，2022年全球和美国石油日均消费量分别达到1.014亿桶和2066万桶，此次可以释放的1.8亿桶石油，仅可以满足全球石油市场约两天的需求量，或者美国石油市场约九天的需求量。

供给短缺问题并未解决

目前俄罗斯在全球石油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难被取代。2021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总产量的12%，平均每日原油产量为1050万桶。替代如此庞大的产量，必须迅速有效提升石油供给侧产能，这个目标较难实现，主要原因如下：



视觉中国图片

一是主要产油国的石油增产有限。虽然美国页岩油气过去几年备受油气价格低迷的打击，然而目前的高油气价格可以推动其强势回归。全球主要产油国似乎也有可能协同扩大石油产量。欧佩克+等主要石油生产国希望油价持续保持高位，以提升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实力，并增强其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力，而且过去15年发生的多次油价崩盘历历在目，因此，欧佩克+对增加石油产能一直小心翼翼，采取缓慢增长石油供应的措施。3月31日，欧佩克+决定5月份每日石油产量增加43.2万桶，这个增产计划对全球石油供给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

二是短期内石油行业基础设施难以满足产能快速增长。近几年受全球低碳转型和需求不振的影响，石油行业投资大幅缩减，各大主要产油国增产需要时间。此外，石油价格低迷也导致了石油投资出现停滞，石油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供给能力短期内无法快速恢复。

所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更重要的作用是可以为增加石油产量和寻找替代提供时间。钻探和石油生产之间存在滞后。据估计，过去的一年中钻井数量增加了近60%，但美国的石油产量只增加了约8%，这是因为钻探需要一段时间才有产出。在2020年油价暴跌期间，许多石油公司破产，疫情影响的人力短缺也限制了油田服务和供应快速提升，进而影响了石油复苏速度，尽管目前钻井数量正在稳步上升，但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2020年2月至7月期间，随着石油需求的急剧下降，钻井数量下降了70%以上。钻井数量暴跌带来的影响至今仍在推高油价。

除了需要迅速增加石油产能，欧盟可能还会寻找其他替代途径，这个也需要时间准备和实施。比如说，欧盟计划加大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以此来替代600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500亿立方米为液化天然气，这些国家的范围很广且充满不确定性。此外，欧盟还计划加大生物甲烷生产和加速推广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当然，除了处理一些不确定性问题，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时间。所以，全球石油供给紧张的局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美国释放石油储备，虽然对降低油价起到了立竿见影的短期作用，但却并未完全解决石油的供给短缺问题，仍然不足以持续地大幅度降低油价。石油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供需，只有市场对于局部紧张局势背景下的石油供应担忧得到真正缓解，全球石油供需才会恢复平衡，石油价格也才会趋于稳定。

此外，目前全球石油供应的伊朗因素不可忽视。当前国际背景下，伊朗会抓住机会积极谋求解除石油制裁，以期重返原油市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在最新预算草案中，将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的石油出口收入预测提高27%。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原油正式进入国际市场，将大幅缓解全球石油供给担忧。